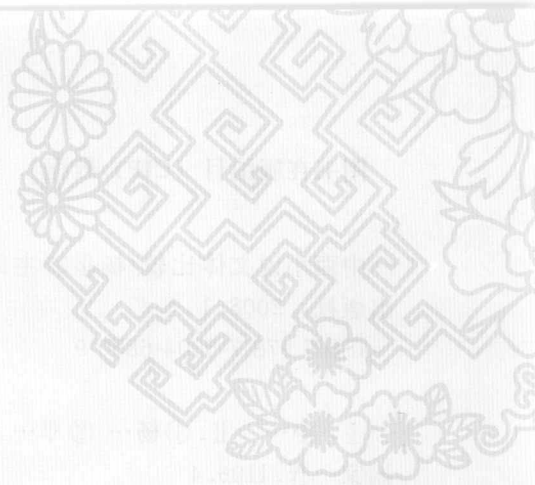


杨星映 主 编
邓阿宁 副主编

中西小说文体比较

Zhongxi Xiaoshuo Wenti Bijia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西小说文体比较

Zhongxi Xiaoshuo Wenti Bijiao

杨星映 主 编

邓阿宁 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小说文体比较/杨星映主编, 邓阿宁副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004-6850-9

I. 中… II. ①杨… ②邓… III. 小说—文体—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7128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guoxiaohong149@163.com)

特邀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40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庆市教委项目

重庆市重点学科文艺学项目



序

杨星映教授主编的《中西小说文体比较》，是一部学术价值高，而且对目前小说理论研究和小说创作具有现实意义的著作。主编通过数年来的潜心研究，搜集大量中外古今的相关资料，吸取以往各个民族优秀的学术成果而又能在比较中独辟蹊径，突出中华民族自身的学术特点，提炼出自己的学术心得，科学地界定了小说文体的性质特征，提出本书写作的指导思想、章节大纲。主编认为：文学作品是以文学文体的方式存在的。对文学文体的研究，中国主要是从体制的辨析进行，包括具体作品的体裁、布局（结构）、语言等；而西方的文学文体学（stylistics）则只研究或主要研究文学作品语言的表述方法和效果。本书对小说文体理论范围的界定，采用中国文学文体的观念，即研究小说文体包括对小说文类的界定、结构（叙事方式）、语体（语言表述方式）等。

主编分析了中西小说形成发展道路的差异，指出：虽然中西小说都起源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但由于中西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的不同，中西小说的形成和发展道路迥异。就文体而言，中西小说文体的不同特色与中西文化传统特别是小说文体观念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又对小说文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综观中西小说文体理论，中国以整体把握的方式，紧密扣合文本具体描写进行批评、点到即止，言简意赅，但理论观点也就在其中生发出来，精粹而透辟；而西方的显著特色则是以知性分解的方式，对小说叙事作形式的、结构的、修辞的、文化语境的建构和批评。

这些观点很有见地。

本书从比较中阐述了中西小说文体发展的共同规律和不同特色，论证了社会文化传统对小说文体的决定作用及小说文体形态的文化机制，揭示出中西小说创作和理论的对小说文体变革的影响。本书的许多理论思想和重

要观点对目前的小说文体理论以至整个文学理论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和启示作用。

我认为本书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得具体深入而具有独到见解。

第一，通过中西小说文体理论发展线索的勾勒和异同之比较，界定了小说文体的性质特征，比较细致地考察了理论与创作的互动关系，给人以相当清晰的理论面目。表现出作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阔的理论视野，古今中西熔为一炉，在小说理论研究中开出新生面。

第二，比较深入地考察、研究了 20 世纪中国小说文体在走向近代、现代的三次嬗变中对西方小说文体理论与小说文体的接受与选择，揭示了近现代西方小说创作和文体理论对中国小说创作和文体理论的影响。

第三，细致梳理了中西小说文体从萌芽、过渡到成熟、革新的过程，总结了文体形态发展的规律，比较异同，阐明形成原因，较好地揭示出中西小说文体的历史发展形态及其社会文化成因。

第四，通过各种类型典范文本的比较（例如历史小说的文本、游历小说的文本、世态人情小说的文本等），对中西小说典型形态进行了平行比较，得出作者自己富有见地的结论。

从本书的写作中，还表现出作者具有严肃认真的学术作风和态度，文献资料丰富翔实，并经过作者梳理、研究，得出自己的学术结论。而且本书在文字表述上清晰、顺畅，具有可读性。

我祝贺这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问世。

杜书瀛

2007 年 12 月 7 日

目 录

| | |
|-------------------------|-------|
| 序 | (1) |
| 第一章 中西小说文体理论比较 | (1)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文体意识 | (1) |
| 第二节 西方小说文体理论的长足发展 | (28) |
| 第二章 中国小说文体的发展和演变 | (89)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形态 | (89) |
| 第二节 20 世纪初中国小说文体的嬗变 | (101) |
| 第三节 新时期小说文体形态 | (114) |
| 第三章 西方小说文体的发展和演变 | (128) |
| 第一节 西方古代叙事文体 | (128) |
| 第二节 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虚构故事 | (136) |
| 第三节 18 世纪小说文体的兴起 | (144) |
| 第四节 19 世纪小说文体的发展 | (167) |
| 第五节 20 世纪小说文体的嬗变 | (187) |
| 第四章 中西历史小说文体比较 | (204) |
| 第一节 中西历史小说观念 | (204) |
| 第二节 地理环境对中西历史书写方式的影响 | (208) |
| 第三节 中西历史小说文体比较 | (218) |
| 第四节 中西历史小说“虚实论”比较 | (234) |

| | |
|-----------------------------|-------|
| 第五章 中西游历小说文体比较····· | (247) |
| 第一节 游历小说的界定····· | (247) |
| 第二节 游历小说的滥觞····· | (250) |
| 第三节 游历小说的兴起····· | (259) |
| 第四节 文化落差中的游历小说····· | (275) |
| 第五节 “游历”的功能及中国游历小说疲弱之因····· | (291) |
| | |
| 第六章 李渔短篇小说与《十日谈》叙事比较····· | (301) |
| 第一节 结构比较····· | (302) |
| 第二节 叙述者与叙事视角比较····· | (324) |
| 第三节 叙事时间比较····· | (337) |
| | |
| 后 记····· | (345) |

第一章 中西小说文体理论比较

文学作品是以文学文体的方式存在的。对文学文体的研究，中国主要是从体制的辨析进行，包括具体作品的体裁、布局（结构）、语言等。而西方把文学文体学（stylistics）界定为：只研究或主要研究文学作品语言的表述方法和效果。对小说文体理论范围的界定，本书采用中国文学文体的观念，即研究小说文体的体制，因此包括对小说文类的界定、结构（叙事方式）、语体（语言表述方式）等。而且，小说叙事必然要落实到语言，语言的表述方式必然体现了叙述方法。这样，谈论西方小说文体理论就不仅包括小说文体学，更包括小说叙事学理论。

虽然中西小说都起源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但由于中西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中西小说的形成和发展道路迥异。就文体而言，中西小说文体的不同特色与中西文化传统特别是小说文体观念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又对小说文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综观中西小说文体理论，中国以整体把握的方式，紧密扣合文本的具体描写进行批、评，点到即止，言简意赅，但理论观点也就在其中生发出来，精粹而透辟；而以知性分解的方式，对小说叙事作形式的、结构的、修辞的、文化语境的建构和批评是西方的显著特色。

第一节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文体意识

一 中国“小说”概念的变迁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神话传说、论辩材料（寓言、谚

语、故事等)、史传野乘、志人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等历史阶段,最后在明清达到成熟和高度繁荣。在不同发展阶段,“小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不同。经过悠久岁月的淘洗,到明清,“小说”概念才由先秦两汉的“论辩材料”和“稗官野史”发展演变为指作家虚构的,以刻画性格为主,包括人物、情节、环境三元素建构的文学样式。因此,中国的“小说”概念经历了由非文学的文章或文章片断向文学文体的转变。从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小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及小说批评的发展,我们可以透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展变化。而古代小说观念的变化体现了小说文体意识的逐步确立。

从先秦到元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的萌芽期。这一阶段的小说批评主要是围绕“小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进行,其实质在于探讨小说的性质(是什么?)和范围(包括哪些作品?)。萌芽期的小说观念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发展:

(一) 余文遗事, 论辩材料

先秦时期的“小说”指的是为诸子论道和策士说客游说服务的论辩材料。“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①这里的“小说”,有人说是“琐屑的言谈、小的道理”,有人说是指先秦的“故事性作品”,包括神话传说、史著中带故事性的史实、诸子中的寓言故事等。其实,“小说”是从“说”衍化来的。从词源学考察,战国时期“说”有几义:说明、悦怍、游说。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把“说”作为与“论”相对的一种文体,对其源流作了扼要说明,并指出战国时策士说客“说”的威力:“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②“论”是论证某种抽象的道理以辨明是非,即“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③“说”是针对现实问题陈述主张、策略,要“动言中务”、“喻巧而理至”^④。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策士说客为了论辩有力、

^① (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四),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25页。

^② 刘勰著:《文心雕龙注》(上),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98年重印,第329页。

^③ 同上书,第327页。

^④ 同上书,第329页。

悦于人，从而推行自己的学说、策略，均常常引用格言、俗语、寓言、比喻、小故事等。如《庄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小说”即指这些为学说及游说服务的论辩材料，兼有解说和悦恻之意。言其“小”，是与“道”即学说相对而言，指其篇幅的短小，与“道”相对的意义之浅薄。这种“小说”是各家皆用的，并非对立的诸子各家对自己之外的别家学说的蔑称。庄子所言“小说”，正是指这种材料。庄子鄙薄的不是“小说”，而是以修饰小说，即以漂亮的言辞取悦于人而求取功名利禄的行为，这当然是离道家出世任性的“大达”很远的了。这样的小说概念，范围宽广，既包括记言，又包括记事，其中也就有人物和事件，但描写简略，只提示线索或粗陈梗概。小说作为论辩手段、材料，各家均可收集储备，也可辑录传世，于是就有了小说书。即桓谭所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① 例如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中说：“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谘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②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有《鬻子》二十二篇，小说家类著录有《鬻子说》。刘勰所云“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即是小说家类的《鬻子说》。鬻熊既有论道的高言宏论的《鬻子》，也有余文遗事的论辩材料的《鬻子说》。类似的例证还有《文心雕龙·诸子》中提到的伊尹的著述。《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列有《伊尹》五十一篇，又有《伊尹说》二十七篇，归入小说家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中云：“《汉志》道家有《伊尹说》五十一篇，今佚；在小说家之二十七篇亦不可考，《史记》《司马相如传》注引《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夏熟。’当是遗文之仅存者。”^③ 可为伊尹的作为论辩材料的小说书之佐证。^④

（二）街谈巷语，稗官野史

汉代的“小说”指的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稗官野史。班固

① 引自《文选》卷三十一江淹诗《李都尉从军》李善注。

② 刘勰著：《文心雕龙注》（上），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98年重印，第308页。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页。

④ 关于先秦“小说”为论辩材料，详见拙文《从〈文心雕龙〉看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中有“小说家”，列于九流十家之末。班固列举了小说十五家并附注，其中既有先秦传汉的书籍，也有武帝时及其后的新著。内容十分庞杂，范围非常广泛。先秦的或依据古人之言，或记古事。汉代的则为封禅养生，多为方士假托。《艺文志》于书目之后总论小说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班固这种“野史”的小说概念乃史家的小说观，与先秦之论辩材料的小说概念不同。这种“稗官野史”的小说观念此后长期影响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使作家难以摆脱正史框架和史学“实录”观念的束缚。《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收录之杂多也一直影响后世将各类笔记杂著归为“小说”。唐代刘知幾就在其《史通》中把小说分为十个类别：“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虽然其中包括了志怪志人小说，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笔记杂著的“小说书”的概念，而不是今天所说的文学形式的小说。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小说类包括：志怪、传奇、杂录（含《世说》、《语林》等志人小说）、丛谈、辨订、箴规。虽然将志怪志人和传奇小说列入，但仍然是小说书的概念范围内。直到清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称小说是“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沿袭稗官野史、笔记杂著的小说观念。当小说逐渐发展为独立的文学形式，这种小说观念阻碍人们正确认识小说的性质和特征，特别是历史小说的性质和特征，把历史小说当作稗官野史、正史的通俗读物，要求严格依傍史实。

（三）异闻佚事，纪实传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指的是记录异闻佚事，要求纪实传信。这一时期，志怪志人小说兴盛。先秦的“小说”本有解说与悦悻双重属性而以解说为主，自汉以来，小说的悦悻性质日渐突出。汉时方士的小说书已兼具“玩好”（娱乐）与“实俟实储”（储备以待皇上随时求问）两种作用。至魏，诵小说已成时尚，甚至成为达官贵人的嗜好。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曾引《魏略》记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事：“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文心雕龙·谐隐》也提到：“魏文因俳

说以著笑书。”^① 足见魏人已将小说用于与俳优一样逗人说笑。此时笑话集（谐隐的一支）也入了小说类。之后，由晋到南北朝，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大量出现，小说的观赏性质日益突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与其前后》就曾指出：“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唯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② 这里，鲁迅讲的就是“小说”从实用到娱乐的转变。小说的这种欣赏价值在当时也已被人直观地认识到，由此引起了小说观念的变化。葛洪指出小说所叙乃“美事”、“深妙奇异”（《神仙传自序》），干宝指出小说“游心寓目”（《搜神记序》）。《文心雕龙·谐隐》云：“‘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又云：“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③ 认为“谐”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文辞浅显通俗，使人发笑，就像小说一样。刘勰因此而指出了小说的悦性性质。时人已直观地认识到小说的悦人、玩好作用，但由于受史家崇实观念和宗教迷信的影响，把小说当作现实的真实记录，对其“尚奇多虚”表示怀疑。这一时期的小说批评虽然认识到小说具有“美事”、“深妙奇异”等特点和作用，但主要是为志怪小说、志人小说的“失实”、“虚错”辩解，仍然强调小说要真实记录异闻佚事、纪实传信。南朝梁人萧绮的《拾遗记序》中提出：“删其繁紊，纪其实美”；“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小说的认识和要求。

唐代，传奇兴盛，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然而唐人的小说批评却并未有大的进展，连一篇传奇的专论都没有，批评的沉寂与创作的兴盛很不相称。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尤其是史学总与文学纠缠在一起，客观上阻碍人们去认识作为文学样式的小说——唐传奇的性质与特征；二是受志人志怪的创作和批评的影响，把传奇看作传写奇闻，志异语怪，因而仍然

① 刘勰著：《文心雕龙注》（上），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98年重印，第271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2页。

③ 刘勰著：《文心雕龙注》（上），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98年重印，第270、272页。

④ 萧绮：《拾遗记序》，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要求纪实传信；三是唐传奇多为文人温卷之作，“以文为戏”，骋才显能（史才、诗笔、议论），游戏笔墨，不足为贵。所以仅有个别传奇作家在故事前后有些关于小说的特点、社会作用的只言片语的议论，基本上仍是继承魏晋六朝的纪实传信观念。而历史学家刘知幾的《史通》所主张的“秉笔直书”、“实录”、“叙事尚简”倒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乌有”“假托”，随意演说

到了宋代，虽然传统的小说观念仍然存在：“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①但小说概念开始从史学框子中跳出，向文学理论靠拢。对于志怪小说，人们认识到“皆不能无寓言于其间”，来源“似实”，“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其实只能“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②，是虚构的；还指出唐传奇“小小情事，凄婉欲绝”，“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③，认识到唐传奇假托神怪，情节婉曲，“凄婉欲绝”，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宋代开始的对小说艺术特征的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受到了注意。赵令畴高度评价崔莺莺的形象：其“才华婉美，词彩艳丽，则于所载絨书诗章尽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态，则不可得而见，及观其文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虽丹青摹写其形状，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④说明他已经认识到小说的人物形象应当塑造得鲜明生动，具有想象的真实。由宋入元的刘辰翁评点了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对小说的人物刻画、语言特色、情节设置、小说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均有所涉及，并认识到小说“大胜史笔”，是进一步从文学的角度看待小说。

随着宋元说话艺术的兴盛，话本小说的兴起，人们的小说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改变。不少笔记杂著记载了当时说话艺术的盛况并对说话和话本创作加以评论，吴自牧《梦粱录》、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的评论颇具代表

① 曾慥：《类说序》，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② 洪迈：《夷坚乙志序》，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③ 洪迈：《容斋随笔》，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④ 赵令畴：《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

性。当时说话共有小说、谈经、讲史、合生四家。小说这一家专门讲述短篇故事。“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①八类。吴自牧指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谈论古今，如水之流。”^②罗烨说：“如有小说，但随意据事演说云云”，“世间多少无穷事，从头历历说细微。”^③这时的小说指的是反映生活中（包括历史与现实）的故事，是说书人的创造。

（五）因文生事，刻画性格

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明代文人仿作和加工整理话本，产生了拟话本这样的短篇小说和长篇白话小说，“三言”“二拍”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的梓行，标志着古代小说的成熟，人们的小说观念也因此有了巨大的转变。李卓吾认为：“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凭空捏造，以实其事耳。”^④之后，清初金圣叹指出：《水浒传》只是借用了历史上三十六人姓名，而“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⑤他又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⑥至此，终于划清了小说与历史著作的界限，明确了小说的虚构性质。在此基础上，李卓吾发轫，金圣叹继承发挥，建构了中国古代典型理论——性格塑造个性化的理论。李卓吾指出《水浒传》“妙绝千古”全在于其人物形象“同而不同处有辨”^⑦，要求注意区分人物的共性与个性。金圣叹则将人物性格刻画与小说特性联系起来，指出作家创作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刻画性格：“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

① 罗烨：《醉翁谈录》，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② 吴自牧：《梦粱录》，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③ 罗烨：《醉翁谈录》，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90页。

④ 《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

⑤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⑥ 同上书，第16页。

⑦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一）第三回回末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

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①而创造了典型性格便获得了永久的艺术生命：“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②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经历了一个从非文学向文学演变即从论辩材料、稗官野史、记录异闻、志异语怪向演说故事、因文生事、刻画性格演变的过程，因此小说观念也经历了纪实传信、游心寓目、虚实参半、虚构假托、情节铺设、性格刻画等等的变化。随着小说观念的转变，史学影响削减，文学因素增加，近代意义的小说文体逐渐形成。到《红楼梦》终于形成典型的人物（性格）、情节、环境三元结构的小说文体。

二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理论的叙事学渊源

小说是用叙述的方式虚拟客观对象世界和人的心灵世界，传达创作主体对于生活的审美感受、体验的文学形式。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叙述人讲述故事是小说的基本特征。在神话传说之后，对故事的讲述西方是史诗，而中国是史传。^③然而正基于此，中西小说的发展分道扬镳，中西叙事学也各呈异彩。追溯中国小说文体理论的叙事渊源，对历史叙事和史传文学的评论正是其源头。

叙事，中国古代最早称为序事，序、叙相通，后又称为叙事。“叙事”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作为文类概念，—是作为写作方法来使用。正式作为文类术语是在宋代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中，其卷首《文章正宗纲目》将“文”划分为：“其目凡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中国古代叙事文类中文体杂多，但成为叙事文类范式的则是历史叙事。章学诚说：“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④历史叙事鉴古察今，作为政治与人生价值的衡定标尺，自上古始，便成为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核心。历史叙事与史学观念在小说文体与小说文体理论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成为悬在

①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

③ 参见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形态》的有关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其头上的标杆。所以杨义先生说：“中国叙事作品虽然在后来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它的形式技巧和叙写谋略，但始终是以历史叙事的形式作为它的骨干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存在着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一实一虚，亦高亦下，互相影响，双轨并进的景观。”^①

对文体的确认和分类自“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始，“自曹丕首列四科八体之后，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陆机《文赋》、萧统《文选》等等，踵前启后，愈分愈细，至《文心雕龙》形成体系完整的文体论，不仅区分文体特征，而且深入研究各种文体的写作要领、源流演变、代表性的作家作品”。^②《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20篇即是文体论，其中《史传》篇正是对历史叙事的文体鉴定。《史传》“原始以表末”，追溯了从上古至魏晋历史著作的渊源发展，提出史籍写作的原则：“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徵盛衰，殷鉴兴废……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核实而书。”排除其征圣宗经思想，从文体的角度看，它确立了史传写作的纪传、编年两种范式和“核实而书”的原则。《史传》还提出：“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③历史著述的纪传、编年二体，实录、直笔、隐讳的叙写原则，《史传》均从理论上给予了确定和论述，这可以说是中国叙事理论的开端。而从汉唐始，史学论著对历史叙事的评述中所包含的叙事原则和叙述方法就一直影响着古代小说的创作和批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史通》是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专书，继承发展了刘勰的观点，对唐初以前史书编纂进一步展开论述，细致地阐述了史书的编纂体制。《史通》有对“二体”、“直书”、“曲笔”、“叙事”等的专论，如卷六“叙事”提出了叙事的一系列原则：“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叙事用晦也。……简者词约事丰，晦者神余象表。”又指出：“叙事尚简”“是叙事不

① 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② 杨星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纲要》（修订版），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6页。

③ 刘勰著：《文心雕龙》（上），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6页。